

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在研究更路簿。

# 用文献带动文化，从小众走向大众 让《更路簿》在现代「活」起来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尤梦瑜

随着现代航海技术的进步，“动态的发展的”《更路簿》早已在历史中“停笔”。通过四处走访与调查，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、唐玲玲发现，现存于世的《更路簿》仅有10余本。

《更路簿》的重大价值与意义不必赘述，那么，面对如此现状，我们又该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呢？

## 大名鼎鼎 却又“无人问津”

《更路簿》的境遇有些尴尬。

我国对于文献资料有着明确的分类：古籍（1912年以前）、民国文献（1912年至1949年）等等。除此之外，可移动文物也有着自己的定义标准。而《更路簿》的尴尬在于，由于现存的版本基本都在私人手中，导致国家在进行古籍、民国文献普查或是可移动文物普查时，这些《更路簿》是完全“消失”的。换句话说，媒体与学界的关注让《更路簿》大名鼎鼎，但当人们在全国权威数据平台中寻找时它却是难觅踪影。普查不到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保护的缺失。

《更路簿》，作为一个手抄文献，可按照古籍和民国文献进行分门别类，即使不是属于以上两类的现代的《更路簿》，也可进入公藏机构，列入收藏类别。”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（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古籍部）主任、副研究馆员乔红霞说。

虽然《更路簿》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，但这仅是对《更路簿》这项技艺的保护而并非是对这些纸质文献资源的保护。

那么，这些尚在私人手中的《更路簿》是否有可能放入公藏单位中呢？

“对于这种情况，公藏单位可以进行征集。出于尊重老船长们的传承，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相应的《更路簿》。此外，私人也可以通过与图书馆或博物馆这些机构协商进行托管，所有权仍归私人。私人保管条件十分有限，因此对于这些宝贵的纸质文献来说最好是能由图书馆、博物馆这样的公藏单位征集或托管，纳入国家文献资源保护体系。专业的机构拥有完善的保管条件及文献的制度化管理，所以，由它们来

保管，《更路簿》的寿命会更长。”乔红霞说。

## 挖掘深层价值 发展现代学术

“《更路簿》记载的是航线，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就是航线，还有古代渔民的出海情况。”乔红霞说，人们应该看到这背后更为丰富的资源。犹如丝绸之路所蕴含的并非只是一条线路上的往来。“虽是航道、线路，但其实已辐射为文化圈。应该以文献带动文化，让《更路簿》这样的珍贵资源从小众走向大众。”

当《更路簿》可以从私人收藏转为面向公众时，学术研究、展览宣传等都可以让它在现代“活”起来，同时，人们可以通过对它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研究，而逐步形成学术类别、知识门类。乔红霞说：“它所代表的其实是南海文化。辐射开来，水文、生态资源、政治、经济等等都是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。”

莫高窟里发现的敦煌文献承载的内容极为丰富，通过学术组织的研究等已形成敦煌学。省社科联研究员赵康太也曾表示，得益于周伟民、唐玲玲两位教授的努力，“也许因为《南海天书》的出现，一门新兴的学科——更路簿学会随之而生”。周伟民在其著作中也有提出基于资料基础丰厚、拥有学理基础和学术空间等，可以尝试建立一门国际性的独立学科“更路簿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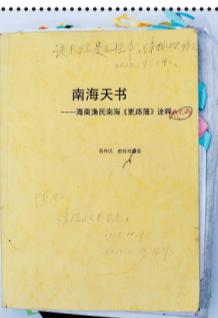
## H 南海循史



周伟民用于研究《更路簿》的资料。



《更路簿》手抄本及复印件。



周伟民与夫人唐玲玲共同出版的《南海天书》。



更路图。（本版照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宋国强摄）

自1989年起，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与唐玲玲伉俪就开始了对《更路簿》的研究。20余年来，通过田野调查、史料收集等方式，两位教授在2015年底出版专著《南海天书——海南渔民“更路簿”文化诠释》，对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《更路簿》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解读。

在该书中，两位教授做出了清晰的解释：海南岛渔民在历史上独创的“南海更路簿”，又称水路簿等，学术界通常称《更路簿》，在没有完备的海图和导航设施的年代，作为指导渔船实践活动的航海指南，即渔民手中的实用工具书，是海南渔民长期在西沙、南沙群岛等通过航海和渔业生产实践留下的经验总结。

在海南渔民航海过程中，用《更路簿》来指导航向时，其中的“更”既指角度，也指时间。路，即里程。由于海路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只能以地名间的间距来标示“路”。于是《更路簿》中的“路”，是一种虚拟的形态，它只有跟“更”和罗盘结合起来才能体现。“更路”（即航线）表示里程。概括地说，“更路”既表示时间又表示航向和里程。簿，就是今天的“本子”。

据周伟民考证，《更路簿》最早产生于元代初年，一位叫符再德的渔民出发南海捕捞，凭借着多次航行，慢慢形成了“更路”。这也是潭门渔港被认为“千年渔港”的重要依据之一。周伟民认为，《更路簿》这个名字至少已经存在七八百年。

通过整理，周伟民表示目前《更路簿》存于世仅有10余本。他二人的著作对多个版本的《更路簿》都作了详尽注解。周伟民告诉记者，这些《更路簿》总体反映了4个特点：首先，《更路簿》完全是为了渔民实用而产生和流传的，它所记录的航道与现在的航道大体一致，经纬度大体相同；第二，所有《更路簿》总体来说都是记录南海更路，简略记录了国外的更路；第三，它证明了中国渔民历史上就已进入西、南、中沙群岛进行捕捞；第四，《更路簿》是动态的、发展的，老船长们会根据经验不断修改补充。

在周伟民看来，这些现存于世的《更路簿》也各有特色。不同的《更路簿》往往所记载的更路也有差异。例如，王诗桃的版本就记录了279条更路，是目前现存版本里记录最多的，而记录最少的则是蒙全洲手中的版本，仅有87条。从内容上看，苏承芬的《更路簿》中出现了中沙更路。在现存版本中，郁玉清抄藏本《定罗经针位》所记载内容历史最为悠久，可追溯至元代末年，但原本已不存在；通过对纸张等推测，周伟民认为卢家炳的更路簿藏本是现存《更路簿》中最古老的，应有一百余年历史。